

欧盟涉台政策立场的演变：态势、 变量及影响^[1]

何达嵩

【内容提要】近年来，尽管欧盟延续了一个中国政策的政治承诺，但在实际政策执行层面逐渐突破传统低敏感度交往形态，通过外交协同、议程嵌入、规则塑造及军事存在等多维路径介入台海议题，呈现出从象征性立场宣示向实质性议题介入的渐进转变。这一变化背后，蕴含着以“价值—安全”为政策导向、以台海议题为地缘政治杠杆、以跨大西洋关系与亚太地区盟友伙伴关系为战略依托的复合逻辑。与此同时，台湾当局长期开展的对欧洲国家政治渗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整体的涉台政策立场。虽然当前欧盟的“实质性介入”表现出鲜明的“有限性”特征，但其介入行为却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对内因战略意图与执行能力错配，导致自身可能陷入成本—收益失衡的“战略透支”风险；对外则推升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损害中欧互信并增加双方关系中的风险管控成本。

【关键词】欧盟 涉台政策 台湾问题 一个中国 中欧关系 亚太安全

【作者简介】何达嵩，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6) 02-0119-23

[1]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盟涉台政策变化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3BGJ08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自1975年中欧建交后,虽然出现过荷兰、法国等国对台售武的恶劣事件,但欧盟作为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家集团,整体上遵循了一个中国原则,坚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和“承诺不与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官方关系”的一个中国政策。在此政治基础上,中欧关系保持了稳定向前发展的良好势头,2003年双方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截至2017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6169亿美元,比1975年的24亿美元增长了约256倍,中欧之间建立起领导人会晤、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等近70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各领域交流和务实合作不断拓展深化。^[1]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东西方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特别是2017年以来美国持续推进对华遏制战略并压拉盟友站队,牵动欧盟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并调整对华政策。2019年欧盟发表“欧盟—中国:战略展望”对华政策文件,正式提出“中国既是合作的伙伴,也是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这一对中国的复杂定位也引发欧盟涉台政策立场的调整,并在2021年出现标志性的政策转折点。2021年,继6月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附和美国和日本首次在七国集团(G7)峰会联合声明中公开对台湾问题表示“关切”,9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印太合作战略报告》,首次将“台海和平稳定”纳入其战略关切范畴,欧盟的涉台政策立场呈现出清晰化转向,即正式从以往的“恪守原则”转向了“战略介入”;10月,欧洲议会全会通过所谓“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决议案,公然鼓动欧台发展所谓“政治关系”,尽管作为欧盟非执行机构的欧洲议会的文件并无法律约束力,但无疑也折射出欧盟内部在涉台立场上的倒退倾向。因此,本文将尝试以2021年为时间分析基点,追踪欧盟涉台政策立场的演变轨迹,分析其立场变化的生成机制,并评估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为学界和实务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参见《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中欧经贸关系的前景将更加光明》,外交部网站,2018年5月1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1206x2_679950/201805/t20180501_9389577.shtml;《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成果清单》,中国政府网,2017年6月4日, 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7-06/04/content_5199627.htm 等。

一、近年来欧盟涉台政策立场的演变态势

中欧建交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欧盟出于发展对华关系的需要，总体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以规避相关政治风险。然而，2017年以来，欧盟开始跟随和配合美国的战略布局，“对华竞争”色彩日益显现，牵动中欧关系从合作为主逐渐转向“竞合”关系格局。在此背景下，欧盟的涉台政策立场开始出现变化，并在2021年公开将台海议题纳入其“印太”战略范畴。之后，虽然欧盟仍旧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表述，但在实际政策操作、与台互动等层面逐渐突破传统低敏感度交往形态，通过外交协同、议程嵌入、规则塑造及军事存在等多维路径介入台海议题，呈现出从政治宣示转向议题操作、从外交协同延伸至安全合作、从规则塑造推进到“法理限缩”^[1]以及与台湾地区交往制度化跃升和层级上移的态势。

（一）涉台立场的外交协同与议程嵌入

以2021年G7峰会联合声明首次纳入台海议题为起点，欧盟在外交层面正式脱离过去在涉台议题上的克制立场，公开配合美国的涉台叙事，介入台湾问题。例如在G7这一多边平台上，作为非列名成员的欧盟连续五年（2021—2025年）协同G7其他成员^[2]，在峰会联合声明中表达对台海安全局势的“关切”，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种议程的常态化嵌入，标志着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从以往的“规避”转向公开介入，并从原来的单边输出范式转向多边政策立场协同。如果说这种政策协同最初是在

[1] “法理限缩”这一法律名词是法学领域中法律解释时的常用术语，是指在法律适用或解释过程中，对规范适用范围进行限制性解释或适用边界收紧。本文所表达的“法律限缩”是指欧盟在对“联大2758号”决议法理内涵进行解释时将决议所蕴含的一个中国原则进行了边界收缩解释。

[2] 欧盟属于G7成员，但因为它是一个超国家组织而非主权国家，不在七国之列，也被称为G7第八个成员。欧盟享受其他G7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但不能成为轮值主席，不主办峰会。参见《G7这十大真相，颠覆你的认知》，新华网，2023年5月19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23-05/19/c_1212189616.htm。

美国压力下进行的被动回应，那么随着欧盟强化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其在台海议题上与美国等盟伴国家的战略协同逐渐走向“主动”，台海议题成为其推进与地区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议程。例如，2025年4月欧盟与日本举行第二届欧日外长战略对话时，重申所谓“台海和平稳定对区域及全球安全与繁荣具有战略重要性，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现状的行径”^[1]；同年6月2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António Costa）与加拿大总理卡尼（Mark Carney）举行第20届“欧盟—加拿大峰会”，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宣称“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双方的共同利益”。^[2]相关事实表明，欧盟试图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塑造为所谓“印太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认知与政策协调基点，进而为其介入亚太事务提供抓手。

与此同时，欧盟还将台海议题嵌入到对华政策框架。2023年4月，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有关中欧关系的讲话中宣称，基于“台湾海峡对欧洲贸易的战略意义、台湾在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方面的战略作用、台湾作为欧盟地缘战略范围的一部分”三重考量，台湾问题在欧盟对华政策中具有“根本性意义”。^[3]这一政策立场被延续到后面的中欧高层互动之中。如2025年7月24日，第25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于北京举行，会后发布的欧盟官方新闻稿刻意加入所谓“对台海局势关切”和“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等干涉性内容。^[4]总之，欧盟试图

[1] EEAS, “Japan: High 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 Kallas holds second EU–Japan Strategic Dialogue with Foreign Minister Takeshi Iwaya,” April 4, 2025,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244826>.

[2]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Canada Summit (Brussels, 23 June 2025) – Joint Statement*, June 23, 202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u5fbf5b/st10671en25-eu-canada-joint-summit-statement.pdf>.

[3] EEAS, “EP Plenary: Speech by High 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 Josep Borrell on EU–China relations,” April 18, 2023,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p-plenary-speech-high-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josep-borrell-eu-china-relations_en.

[4] European Council, “25th EU–China summit – EU press release,” July 24, 202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5/07/24/25th-eu-china-summit-eu-press-release>.

通过“议题关联”，在不改变一个中国政策表述的前提下，提升台湾问题在中欧关系中的权重，作为其运作对华关系的“政治筹码”。

近年来，除了德法意三国在 G7 框架下多次插手台湾问题外，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也开始实质性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个别国家甚至一再挑战中方底线。例如 2021 年 11 月 18 日，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2022 年，立陶宛农业部、交通与通讯部、经济与创新部等多个部门副部长级官员先后率团窜访台湾地区；2023 年 1 月捷克当选总统帕维尔（Petr Pavel）罔顾中方多次劝阻与交涉，执意同蔡英文通话；同年 3 月捷克众议院议长亚当莫娃（Markéta Adamová）率团窜访台湾地区。2023 年和 2024 年，德国教育部时任部长与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国务秘书等高官分别窜台，德国议会甚至公然邀请被大陆通缉的“台独”分子沈伯洋参加听证会。相关国家当权政治势力的错误行为不可能不在欧盟内部产生恶劣影响。

（二）涉台议题的“规范塑造”与“法理限缩”

近年来欧盟涉台政策立场的变化，不仅体现为外交协同和议程嵌入，还表现在其持续强化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战略叙事框架。自 2021 年欧盟公开表露出干涉台湾问题的立场以来，欧盟在所有涉台立场的正式表态中，都将“和平解决”确立为处理台湾问题的核心原则，反复重申所谓的“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特别是还试图建构所谓“台湾海峡作为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的叙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相关规定，台湾海峡水域分别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中国尊重各国依法合规在台湾海峡相关水域享有的航行权利，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挑衅、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非法活动。实质上，欧盟无论是宣扬所谓“和平解决”，还是主张所谓“台海航行自由”，都无非就是为其介入台海、干涉中国内政提供冠冕堂皇的借口，为其拓展自身战略利益提供“合理性”

依据，同时也是向美国递交“投名状”。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还追随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不涉及台湾”议程。近年来，美国反华“亲台”势力竭力散布“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身份，但没有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虚假叙事，妄图在法理层面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基础。无独有偶，2024 年 10 月，欧盟委员会就业与社会权利委员施密特(Nicolas Schmit)在欧洲议会全会辩论会代表博雷利发表演说时宣称，“联大第 2758 号决议非常简短，仅有 150 个字。而在这 150 个字当中，‘台湾’一词并未出现”。^[1]2025 年 10 月，欧盟发言人发表声明，再次妄称联大第 2758 号未提及台湾的归属。欧盟试图通过对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法理内涵进行“限缩性解读”，制造“法理灰色地带”，为其提升与台湾地区的实质关系寻求“法理空间”，无疑将会对其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形成挑战。

（三）增强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安全建构

欧盟在防务领域长期处于结构性依赖状态，缺乏自主防务力量，在安全方面主要倚重于美国主导的北约框架所提供的军事保障，因而所能投射到台海地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近年来，欧盟为彰显其在所谓“印太”安全事务中的存在感与影响力，开始增强在台海地区的军事投射。

首先，欧盟支持其成员国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展示所谓“维护航行自由的权利”。2023 年 4 月，博雷利在法国《星期日报》发表文章，称台湾在经济、商业和技术方面都“与欧盟息息相关”，并呼吁欧洲国家海军到台湾海峡巡逻，以“表明欧洲对这一绝对关键地区航行自由的承诺”。^[2]

[1] EEAS, “China: Speech by High 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 Josep Borrell at the EP plenary on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UN resolution 2758 and its continuous military provocations around Taiwan,” October 22, 2024,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china-speech-high-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josep-borrell-ep-plenary-misinterpretation-un_en.

[2] “EU’s Borrell Asks European Navies To Patrol Taiwan Strait,” The Defense Post, April 23, 2023, <https://thedefensepost.com/2023/04/23/borrell-european-navies-taiwan-strait/>.

而实际数据显示，2021—2025 年间，法国军舰 4 次穿越台湾海峡，荷兰和德国各一次。

其次，将“协调海上存在”（Coordinated Maritime Presence, CMP）机制扩大到亚太地区，谋求在亚太海洋安全领域的影响力。CMP 机制旨在通过整合欧盟成员国的海军资产，在关键海域部署联合海上力量，以“应对共同安全关切及地缘政治风险”。该机制最初主要运用于欧洲周边海域，随着欧盟“海洋利益区”的扩展也被推广到亚太地区。2023 年欧盟推出题为《加强欧盟海上安全战略，应对不断变化的海上威胁》的新版“欧盟海上安全战略及行动计划”报告，明确将亚太地区划入其战略关切区域，并在文本中加入“在东海、南海、台海的武力展示和日益加剧的安全形势，直接影响欧盟的繁荣与安全”的怪论。^[1]

再者，将台海议题纳入与所谓“印太伙伴”的多边或双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一是融入美国拜登政府时期主导的“一体化威慑”架构，在台海安全议题上展示战略协同。2021 年以来，法、德、荷参加了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和美澳“护身军刀”等联合军事演训，其间不乏滋事挑衅行为。例如，2024 年 5 月荷兰皇家海军一艘护卫舰与美军在南海进行联合演习后又穿越台湾海峡赴韩国参加环太军演。二是将台海议题嵌入与“印太伙伴”的双边安全对话议程。欧盟在与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战略磋商中，开始刻意将“台海和平稳定”从一般性政策宣示转化为实质性的对话议题甚至纳入潜在的安全合作领域。例如，在 2024 年和 2025 年的欧盟—日本外长级战略对话上，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都妄提了“台海和平稳定”等歪调。

（四）欧盟与台湾地区互动的制度化跃升与层级上移

长期以来，欧盟囿于一个中国的政治承诺，仅在经贸、科技、人文等

[1] European Commission,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the update of the EU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and its Action Plan: An enhanced EU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for evolving maritime threats*, March 10, 2023.

敏感度相对较低的领域与台湾地区保持有限的交往。然而，随着欧盟对华竞合战略的推进，台湾问题被当作其对华竞争的一个筹码，而台湾地区也被视为是能够“协助欧盟强化供应链韧性”“分散对华关系风险”的所谓“民主伙伴”。为此，欧盟在表示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却在不断加强与台湾关系的发展，正如2022年博雷利所宣称的，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阻止欧盟坚持和加强与台湾的合作。^[1]正是在这一政策立场导向下，欧台关系发展逐渐升温，并出现了从低政治敏感度的“低阶”领域向高政治敏感度领域延伸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台经济交流的制度化跃升使得双方交往开始呈现“官方”实质关系的色彩。近年来，欧盟与台湾地区的经济联系增强。据相关公开资料显示，欧台贸易额在经历了2016—2021年的快速增长后，2021年以来继续呈现增长趋势，从2021年的约687.5亿美元上升到2025年的约748.6亿美元；在投资方面，台湾对欧盟投资总体呈连年增长态势，从2021年的约7.2亿美元跃升至2023年的约49.7亿美元峰值，2024和2025年虽回落，但5年累计投资约92.9亿美元。欧台经济关系的发展，也催生了双方对话机制的制度化。2021年以来，欧台之间形成了以贸易与投资对话和以“欧盟创新周”为代表的产业合作平台等为核心的机制化交流。

以“欧盟—台湾贸易与投资对话”为例，2022年欧盟委员会与台方对既有经贸磋商框架进行升级，正式建立贸易与投资对话机制，并由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与台湾地区经贸部门举行定期磋商，围绕供应链安全、投资环境及产业合作等议题开展政策沟通，至2025年已举行4轮对话^[2]，成为当前欧台之间最为稳定的经济对话交流渠道之一。贸易总司作为欧盟贸易

[1] EEAS, “Taiwan: Remarks by High 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 Josep Borrell at the EP debate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September 13,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taiwan-remarks-high-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josep-borrell-ep-debate-recent-developments_en.

[2]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Taiwan hold fourth Trade and Investment Dialogue,” December 12, 2025,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news/eu-and-taiwan-hold-fourth-trade-and-investment-dialogue-2025-12-12_en.

政策的最高执行机构，其总司长与台湾地区经贸部门负责人举行机制化对话，标志着双方经贸关系在所谓“非官方”框架下实现了带有“官方”实质关系性质的高级别政策协调。

近年来，台湾当局将产业创新合作作为深化对欧经贸联系的重要抓手，并借助相关产业合作活动加强与欧洲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其中，“欧盟创新周”逐渐成为双方开展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平台。“欧盟创新周”是由欧盟委员会增长总司与台湾地区经贸部门共同在台主办的两年一度的交流活动，主要聚焦技术和产业等议题，期间欧盟委员会下属多个相关执行机构负责人或官员赴台活动，与台湾当局“官员”会面。

在成员国层面，2021年斯洛伐克与台湾地区举办首届“斯台跨部会经济合作咨询会议”；2022年立陶宛与台湾地区建立了“次长级经济对话机制”；2024年法国则将往年的“法台经贸对话会议”提升为“法台高层经贸对话会议”。另外，波兰、捷克等国在2021年之前就与台湾建立了所谓“次长级”经贸对话机制，截至2025年已分别举办13届和8届。总之，部分欧盟国家与台湾地区之间实质上以经贸等功能性对话机制的制度化为载体和通过交往层级的提升形成了“准政治关系”，这不仅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对于欧盟整体涉台政策立场也会起到不好的示范影响。

另一方面，政治接触的公开化与层级提升侵蚀一个中国原则。近年来，欧盟与台湾地区的政治接触从幕后走到台前，从“低阶接触”转向“高阶试探”。2024年5月赖清德当局上台后，台湾地区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窜访了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法国、意大利、立陶宛、荷兰和波兰等国；2025年11月，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和林佳龙进入欧洲议会大楼，出席所谓反华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的年度会议，而萧美琴成为首个进入欧洲议会建筑发表演说的台湾“高官”。此外，双方在人权领域的互动也日益呈现制度化和“政治化”趋势。2021年以来，欧盟在美国主导的“价值观同盟”体系下，加强了对台湾地区的“价值支持”，双方以“人权咨商会议”为平台展开定期对话和交流。与以往间断性的、限于不会影响中欧关系范围的人权议题互动不同，近年来，欧盟与台湾地区的人权互

动不仅呈现制度化,而且通过定期“检视”人权进展、共同“重申”对所谓“民主、人权、法治”的“坚定承诺”,强化对台湾所谓的“民主价值伙伴”的身份认定,为台湾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政治价值合法性”背书,人权领域的互动由此成为双方关系中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维度。可见,当前欧盟与台湾地区的人权磋商是在“民主、法治”等幌子的掩盖下,进行非官方但具有实质政治意涵的政治互动,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蓄意侵蚀。

二、欧盟涉台政策立场演变的关键变量

2021年以来欧盟涉台政策立场的复杂演进,并非孤立、偶然的决策结果,而是在多重变量交互作用下的产物,其背后蕴含着以“价值—安全”为政策导向、以台海议题为地缘政治杠杆、以跨大西洋关系与亚太地区盟友伙伴关系为战略依托的复合逻辑。与此同时,台湾当局长期开展的对欧洲国家政治渗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整体的涉台政策立场。

(一) 价值—安全逻辑的政策导向

近年来,在“规范力量欧洲”和“地缘政治欧洲”双重逻辑驱动下,欧盟在台海议题上逐步呈现为以价值导向和泛化所谓“欧盟安全利益”为核心目标的复合逻辑。意识形态划线与泛安全化操弄二者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当前欧盟在涉台问题上的认知框架、战略叙事与行动路径。

首先,在价值层面,欧盟自诩为“规范性力量”,惯常打着“民主、法治与人权”的旗号进行对外价值输出,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地缘政治干涉。在2021年出台的《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中,欧盟宣称“民主”和“人权”原则在“印太”地区受到“威权政体”的威胁,欧盟必须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合作,巩固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1]同时,欧盟也积极呼应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维护者对抗修正者”的二元叙事,将中俄等国视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在具体对华政策实践中,欧盟

[1] European Commission,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September 16, 2021,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jointcommunication_2021_24_1_en.pdf.

显著提升了“价值观外交”的比重,并逐步将其价值观议程与台湾问题挂钩,强化对华外交中的“规范性”取向。欧盟妄指实行“西式民主”的台湾地区与其共同享有“民主、法治与人权”等价值理念,是“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在这一认知和叙事框架下,欧盟一方面将对台湾的价值认同与对台湾的政治支持联系起来,如2021年欧洲议会通过的“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决议案强调台湾作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社会和技术先进的经济体”有助于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维持“基于规则的秩序”;另一方面,将“价值认同”作为欧台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2023年欧盟驻台机构“欧洲经贸办事处”(EETO)发布的年度欧台关系概况中宣称,欧盟与台湾地区在“民主、自由、人权及法制”等核心价值上有类似的理念,这些理念“对于双方贸易及投资至关重要,也是建立有韧性和稳定合作基础的关键”。^[1]可见,当前欧盟对台所谓的“价值认同”已成为其公开介入台海事务的政治手段,亦是其对华“制度性竞争”的策略选择。

其次,在安全利益方面,“地缘政治欧洲”因素成为欧盟涉台政策立场调整的另一核心动因。近年来,美国持续推进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印太”战略布局,牵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动,使欧盟日益认识到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秩序正处于深刻变动与重构阶段。在欧盟看来,所谓的“印太”地区拥有全球五分之三的人口,创造了全球60%的GDP,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是欧盟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其在该地区所建立的重要区域贸易伙伴关系在欧盟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占有四席。^[2]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2024年间,来自“印太”地区的进口增长了81.1%,出口增长了38.3%^[3],是故,欧盟进一步将亚太地区视为其重要的战略利益区,开始以应对所谓“印太地缘风险挑战”为由,逐步加强对“印太”地

[1] EETO, *EU-TAIWAN RELATIONS*, 2023,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24/2023%20EU-Taiwan%20relations%20brochure%20FINAL_0.pdf.

[2] European Commission,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September 16, 2021,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jointcommunication_2021_24_1_en.pdf.

[3] Eurostat, “EU trade with the Indo-Pacific region: €848.0 billion,” November 4, 2025,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w/ddn-20251104-1>.

区的战略投入，并将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台海议题纳入其“印太安全合作”布局，切入点就是先对台海议题进行泛安全化叙事建构。一方面，将台海议题与数字时代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韧性相关联。2022年9月，博雷利在欧洲议会辩论中讲话时强调，台湾的半导体生产占全球半导体产业收入的近三分之二，而在最先进的芯片领域则高达90%，并称此“对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1]另一方面，将台海议题与国际贸易与能源通道安全相关联。2025年3月欧盟先后发布《重新武装欧洲计划/2030战备计划》和《欧洲国防白皮书：2030战备计划》，称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升级可能会切断欧盟获得关键材料、关键技术和部件的途径。^[2]由此，“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就可以被欧盟堂而皇之地建构为“保障欧盟在印太区域利益与战略安全的关键政策目标”，“安全韧性”构建亦成为欧盟涉台政策立场的核心叙事和政策导向。因此，欧盟从2021年开始，在相关双边和多边机制中强化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和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方式改变现状”的政治叙事，以确保台海议题服务于欧盟自身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拓展。

（二）以台海议题为地缘政治杠杆

近年来，亚太地缘战略价值的凸显催动欧盟提升在该区域的参与力度，并寻求在塑造亚太未来秩序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目标从两任“欧盟外长”的言论中可见一斑。2024年6月，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演说中强调了欧盟与“印太”地区的战略关联性，声称必须以更全面的方式看待彼此，而不是仅仅从经济角度看待，因为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经济和战略

[1] EEAS, “Taiwan: Remarks by High 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 Josep Borrell at the EP debate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September 9,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taiwan-remarks-high-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josep-borrell-ep-debate-recent-developments_en.

[2] European Commission, *White Paper for European Defence-Readiness 2030*, December 23, 2025,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e6d5db69-e0ab-4bec-9dc0-3867b4373019_en?filename=White%20paper%20for%20European%20defence%20%E2%80%93Readiness%202030.pdf.

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1] 2025 年 11 月，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在第四届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上声称欧盟与“印太”地区的广泛伙伴关系包含三大支柱：一是安全与防务，二是经济联系，三是可持续性。^[2]

由上不难看出，欧盟涉台政策立场的演变不仅源于价值导向和安全目标驱动，同时也在于将台海议题作为拓展其在亚太地区战略存在、介入区域秩序构建的关键地缘政治杠杆。在安全领域，欧盟选择将台海议题与其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进行深度绑定，并将其作为参与亚太地缘政治竞逐的重要抓手。换句话说，欧盟涉台政策算计的核心不在于其表面所宣称的保障其具体的经济和“贸易通道安全”“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等利益，而在于将台海议题转化为服务其拓展整体“印太”战略利益的战略工具。例如，欧盟以维护台海“航行自由”为名展示其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全球角色；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为由，增强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存在和海事安全合作，从而将其战略触角实质性地延伸到亚太地区。基于这些考量，欧盟在 2021 年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纳入台海议题；2023 年 6 月，欧洲理事会在其 27 国峰会结论中首次出现关于台海局势的立场表述；而 2025 年出台的欧洲国防白皮书同样将台海局势列入欧盟战略安全评估，强调“台湾地区现状的变化将给欧洲带来深远的经济与战略影响”。欧盟提出“台海现状”问题，本质是无视“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才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根源和破坏台海现状的最大危险这一事实，并非真正要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而是以“维持现状”为名，行地缘政治干涉之实。可见，当前台海议题已被深度嵌入欧盟整体的“印太”安全战略框架之中，台海

[1] EEAS, “Shangri-La Dialogue: Speech by High Representative Josep Borrell on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une 1, 2024,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hangri-la-dialogue-speech-high-representative-josep-borrell-security-asia-pacific-region_en.

[2] EEAS, “EU-Indo-Pacific Ministerial Forum: press remarks by High Representative and Vice-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Kaja Kallas,” November 21, 2025,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indo-pacific-ministerial-forum-press-remarks-high-representative-and-vice-president-european_en.

安全与欧盟安全的结构性关联被构建成为欧盟介入亚太安全事务、谋求确立其作为该地区不可或缺的“规范性行为体”和“安全提供者”角色的重要途径。

（三）欧盟“印太”联盟策略的驱动

欧盟将台海议题作为参与所谓“印太”地缘博弈的战略杠杆，在实施策略上则选择以强化联盟网络与多边安全协作为战略依托。自2021年推出“印太战略”后，欧盟重视推进与所谓“志同道合”伙伴关系的发展，在发布的多份战略文件中，皆强调要与盟伴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例如，2022年3月21日欧盟通过的《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宣称，伙伴关系是支持欧盟成为全球战略参与者的工具，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多极世界中，“欧盟需要与合作伙伴一起为一个更安全、更公正的世界提供安全保障”。^[1]2024年6月，欧洲理事会通过的《2024—2029战略议程》提出将与合作伙伴密切接触，“发展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应对共同的挑战”。卡拉斯在第四届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上也提出将持续扩大在“印太”地区双边和区域层面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2]正是在依托“同盟协作”的策略下，2021年以来欧盟在台海议题上重视与所谓“印太”盟伴国家的战略协同，在多边框架下围绕台海议题进行泛安全化叙事建构、参与推动安全合作。

欧盟选择将盟伴协作作为战略依托的原因在于：一是所谓“多边主义”国际秩序观的选择。作为自视为“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行为体，欧盟将其身份与全球规则制定及多边秩序建设紧密绑定，倡导建立所谓“基于有效

[1]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For a European Union that protects its citizens, values and interests and contribute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March 21, 2022,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7371-2022-INIT/en/pdf>.

[2]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Building together a resilient, prosperous and secure future,” November 21, 202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5/11/21/building-together-a-resilient-prosperous-and-secure-future-chair-s-statement-eu-indo-pacific-ministerial-forum-brussels-20-21-november-2025/>.

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1] 这种定位使其在对外交往中，倾向于推动并参与多边合作框架，并以此作为延伸影响力、实现政策目标的核心机制。二是制度主义逻辑的内生影响。欧盟认为，在亚太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通过强化内部协调与集体行动，不仅可以提升欧盟自身行为的“合法性”，而且可以通过多边制度平台塑造外部环境、降低行事成本，因而在台湾问题上，其重视与所谓“志同道合”伙伴之间的合作，往往会借助所谓“共同抵御区域地缘政治风险”旗号介入亚太安全事务。三是基于利益互换的逻辑。欧盟一方面希望通过配合美国的遏华战略，换取美国在其他领域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台海议题的政策协调，巩固与美国等盟友伙伴的互信。四是受地缘战略利益的驱动。欧盟通过参与台海安全事务，巩固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关键“印太”伙伴的战略协作关系，进而系统性地拓展并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存在。换句话说，作为当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热点”的台海议题，已成为欧盟深化与“印太”地区行为体战略对接并参与塑造区域安全架构的重要切入点。五是所谓“务实主义”考量。欧盟基于自身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能力相对有限的战略现实，选择与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盟伴体系深度对接。这一战略选择的盘算在于：一方面可依托同盟框架下的集体威慑资源，拓展自身在“印太”安全事务中的实际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与盟伴协同，降低行动成本和单独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

（四）台湾当局的政治渗透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民进党当局利用欧盟对华政策转向“竞合”的“契机”，推进“美欧并重”的所谓“国际空间拓展”路线，持续强化对欧洲的

[1] 从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开始，欧盟明确将支持和推动基于“有效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设定为自身的战略目标。作为一个实施许多超国家规则和规范的区域多边机制，欧盟视“有效多边主义”为区域机制的自然延伸，是欧盟规范性力量的体现。除了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推动“有效多边主义”，作为一个地区多边治理行为体，欧盟也试图在联合国之外以地区间外交为手段推动其“有效多边主义”的秩序理念。参见陈志敏、吉磊：《欧洲的国际秩序观：“有效的多边主义”？》，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4年第1辑，第101—123页。

政治渗透。例如，在政治领域，民进党当局复刻对美交往“经验”，大力推动所谓的对欧“议会外交”，加强对欧洲议员的政治游说。可以说，近些年来欧洲议会以及一些欧盟国家的议员已成为欧洲地区亲台甚至“挺独”的主要势力。2025年11月萧美琴能进入欧洲议会发表演讲，疑是台湾当局花费巨资捐款游说换来的。在经济领域，民进党当局则打着“台湾能帮忙”的口号，利用参与和设立相关经济金融平台等途径，拓展与欧盟国家特别是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简称欧复行，总部设在英国伦敦，业务主要面向中东欧、中亚和地中海地区）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就以“中国台北”（Taipei China）名义和“捐助方”身份持续参与该行业务，为该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vital support）。^[1]台湾当局借助这一渠道，利用经济民生项目合作在一些中东欧国家进行政治渗透。仅2022—2025年间，台湾当局与欧复行就连续举办了4次“捐赠方日”会议，借援助乌克兰及周边受冲突影响国家、发展数字合作等由头，与相关受援国进行“官方”实质互动。又如，2022年1月，台湾当局为持续推动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施行“强化欧洲链接”计划，宣布设立2亿美元“中东欧投资基金”和10亿美元“中东欧融资基金”。

当前，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渗透行为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游说和经济领域的“金元外交”，更扩展至舆论操控和认知战、智库合作等多个领域，意图通过舆论引导，将台湾问题嵌入欧洲的政策议程与战略辩论。例如，在2021—2024年间，台湾时任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通过密集接受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多国主流媒体的专访，将台湾议题嵌入欧洲的民主话语体系与安全议程之中，着力塑造其所谓“民主捍卫者”及“区域安全利益相关方”的“国际形象”。这种欺骗蛊惑伎俩超越传统游说范畴，旨在将特定议题由媒体话语转化为政治议程，进而影响欧盟层面的对华政策取向。另外，加强与欧洲学界和智库互动也是台湾当局进行渗

[1] 参见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aipei China: EBRD donor profile,” <https://www.ebrd.com/home/work-with-us/donor-partnerships/taipei-china.html>。

透影响的重要手段。2016—2024 年 8 年间，民进党当局用于“加强对欧学术界交流及协助团体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等”和“持续强化与欧盟及英、法、德等理念相近伙伴及欧洲重要智库之合作”的年度预算经费从 2350 万元新台币上升到 1.42 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的目的企图在舆论造势与政治议程之间建立联动机制，二者相互配合，将台海议题嵌入欧盟政策议程。

综上所述，2021 年以来欧盟的涉台政策呈现显著转向，其核心逻辑已由先前以“战略避险”为主导的审慎立场，逐步演变为“战略介入”为驱动的关系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调整标志着欧盟在应对台海议题时，日益重视以其整体战略利益为导向，推动政策立场向更突出“安全属性”、议题操作更具“工具性”的方向演进，“安全维度”甚至已成为比经贸议程更优先的议题。这一演变与欧盟应对亚太地区力量格局变动、加强跨大西洋战略协作、提升自身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等考量密切相关。

三、近年来欧盟涉台政策立场演变的影响

近年来，欧盟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台湾问题，但受到地理距离和利益相关程度等限制，欧盟采取的是一种“有限介入”模式，其政策重点并非追求直接的军事存在或扮演主导性安全角色，而是倾向于通过综合性、低负荷方式，构建一种以所谓“规则塑造”、伙伴网络与有限能力建设为核心的低成本、低风险、非对抗性介入模式，实现以较低的政治与军事投入彰显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以免战略上被边缘化。可见，当前欧盟的“有限介入”模式兼具“战略避险”和“战略进取”双重功能。然而，“战略避险”与“战略进取”二者相悖，使欧盟陷入“双重功能困境”，进而对内因战略意图与执行能力错配而导致自身可能陷入成本—收益失衡的“战略透支”风险，对外则推升了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损害了中欧互信并增加了双方关系中的风险管控成本。

（一）目标与能力错配下的“战略透支”风险

当前欧盟的涉台政策立场宣示，是其打着所谓“规范性诉求”“安全关切”

与“经济利益”旗号在亚太地区推进其战略利益的集中投射和践行，但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并不取决于话语的声大声小或坚定与否，而根本在于能否构建起一套与其政策相匹配的、连贯且可强力执行的能力资源与政策手段体系。然而，欧盟在这两个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短板，从而容易使自身陷入成本与收益失衡的战略损耗和透支境地。

首先，欧盟的军事能力尤其是海军规模与其在台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抱负”之间存在显著落差。一是虽然欧盟早在2013年就提出“战略自主”的概念，推动自主军事能力建设，加强了国防支出和投资，但迄今为止，仍缺乏完整、自主的防务能力。欧盟大部分国家依赖北约提供的安全保障，在防卫技术和军事装备上依赖于美国的支持。二是欧盟的防务安全政策由各成员国主导，而各国对推进共同军备力量建设存在较大分歧，这意味着欧盟难以有效整合各国军事资源。^[1]据知名全球军事实力排名网站“全球火力”（Global Firepower, GFP）发布的2026年全球火力排行榜显示，作为欧盟大国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全球火力指数（GFP）排名分别是：法国（0.1798）排全球第6位，意大利（0.2211）排在第10位，德国（0.2463）排名第12；与之相比，中国（0.0919）排名第3，印度（0.1346）排名第4，韩国（0.1642）排名第5；在海军人员方面，中国是38.4万人，法国是4.7万人，意大利是3万人，德国约为1.6万人^[2]，欧盟的军事实力与亚太地区主要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因此，欧盟能否在保障欧洲安全的同时有效支撑在亚太地区的远程力量投射，成为其一个关键的战略疑虑。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开始在欧洲、亚太等地区呈现战略收缩态势并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负担、乌克兰危机持续消耗欧盟传统战略资源的双重背景下，未来欧盟的防务压力势必进一步增大。若欧盟为彰显所谓“印太”影响力而选择强化在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恐将导致“战略透支”。三是欧盟面临显著的军事力量不

[1] 董一凡：《欧盟展望未来军事发展趋势》，载《中国国防报》2023年11月13日，第4版。

[2] Global Firepower, “2026 Military Strength Ranking,”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listing.php>.

对称性与作战体系脆弱性，其作为域外行为体，在亚太地区维持常态化远洋部署，对后勤保障、装备更新与人员轮换构成现实考验。即便欧盟并不准备在军事方面扮演直接的重要角色，而选择依托盟伴协作分担战略风险和成本，但这可能会让欧盟陷入被迫卷入非必要冲突或沦为阵营对抗中依附者而承担连带成本的“同盟陷阱”。

其次，欧盟在台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抱负”与欧盟内部仍显碎片化的行动能力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当前，欧盟成员国在践行“印太”战略时存在分歧，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认为“印太战略”可以针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发力，更加关注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应对气候危机等议题，而不是涉及军事、政治与主权层面的传统安全议题。^[1]只有少数国家对增强“印太”军事存在表现积极，大多数欧盟国家仍倾向以政治、经济和非军事方式介入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在台湾问题上，欧盟内部的政策立场更是缺乏共识。虽然近年来少数中东欧国家与台湾地区关系拉近，但多数欧盟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谨慎立场。作为欧盟主导力量之一的法国更是主张“战略自主”，例如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归国后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欧洲绝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成为美国的“追随者”，需要有欧洲战略，避免卷入中美大国竞争的冲突风险。^[2]因此，在缺乏高度一致的政策共识与收益预期情况下，欧盟在台湾问题上很难形成统一意见。这一状况直接限制了欧盟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开展及时、步调协调且具有实质影响的联合行动，从而使欧盟在台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抱负”与其内部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由此可见，当前欧盟的涉台政策存在明显的能力赤字，目标和能力投射之间的不匹配导致其政策存在脆弱性和风险性。欧盟介入台海问题不仅难以达成预期效果，反而可能分散其应对内部

[1] 丁纯、罗天宇：《从亚洲战略到“印太战略”：欧盟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及逻辑》，载《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1期，第21-22页。

[2] “Macron says Europe must not be ‘follower’ of US, China on Taiwan,” france24, April 9, 2023,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30409-macron-says-europe-must-not-be-follower-of-us-china-on-taiwan>.

挑战与更紧迫全球议题的精力，同时有背上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战略负担和承担相关风险之虞，与其希冀低负荷和低风险战略介入的算计相悖。

（二）损害中欧互信并增加双方关系中的风险管控成本

在“规范力量欧洲”和“地缘政治欧洲”战略复合驱动下，欧盟在“印太”地区表现出更强的“战略进取”姿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投入，并将台海安全议题作为“印太”参与的地缘战略杠杆，在台湾问题上从“战略克制”转向“战略介入”；与此同时，欧盟又不断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肯定中欧合作的重要性，这显示欧盟的对华政策力图走向所谓多元与平衡，寻求在价值—安全—发展这三大核心利益上的目标兼容，构建一个既能抵御战略风险又能保持对外价值投射并可促进自身战略利益的利己政策模式。这一政策模式反映欧盟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已经重构，从传统的以发展为主转变为安全、价值和发展协同演进。然而，在中欧关系的现实实践中，追求价值外溢、构筑安全壁垒和争取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主权是一个国家核心利益中的根本性要素，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而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因此，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成为检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正如202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中欧第13轮高级别战略对话中所指出的，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希望欧方能以实际行动尊重中方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1]可见，欧盟以价值—安全为导向的涉台政策立场与中国的核心利益存在直接冲突，其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不仅直接削弱双方的战略互信，而且由此引发的摩擦直接抬高了中欧在各领域的合作成本与政治风险。具体表现为：双方旨在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努力受到干扰，在经贸、投资、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的务实合作也因政治基础的动摇而面临不确定性。此外，欧盟若意图在台海彰显实质性影响力，则需显著提升

[1]《中欧举行第十三轮高级别战略对话》，外交部网站，2025年7月3日，fmprc.gov.cn/wjzbzd/202507/t20250703_11664024.shtml。

其在该区域的战略投入，特别是强化长期的政治介入与军事存在。此举意味着欧盟不仅需要提供持续且可信的安全承诺，还可能要深化与美国、日本等区域伙伴的防务合作，强化有涉华指向性的海上力量部署、情报共享等具体措施。这不仅直接会增加欧盟的军事成本，而且将进一步损害中欧互信，增加相关欧盟成员国同中国发生摩擦冲突的潜在风险。

（三）推升台海乃至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稳定性

近年来，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路线，不断进行谋“独”挑衅；而美日等国为遏制中国，不断加大“以台制华”力度，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严重危害台海乃至地区和平稳定，而欧盟对台湾问题的介入无疑推升了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一方面，欧盟任何插手台湾问题的言行都将给“台独”份子释放错误的信号。赖清德上台以来，继续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将强化台湾军力作为主要施政目标之一，着力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勾连，在2026年“总预算案”中，军费预算创历史新高，突破GDP占比3%大关，赖清德还扬言要在2030年之前将其提升到GDP占比5%。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不断企图制造所谓“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台湾”的“悲情”效应，以博取美欧日等外部势力支持。例如2025年10月，台湾安全机构负责人林飞帆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专文，借乌克兰危机竭力凸显台湾加强军事防卫的所谓“正当性”与“重要性”。另外，民进党当局还不断渲染所谓“中国大陆军事威胁”，并以此衍生安全议题举办安全论坛，如依托台湾安全智库举办“台北安全对话”，广泛邀请欧美国家前军政高官、战略学者、军工企业代表等参与，以此推动所谓“台湾安全国际化”。可以说，当前赖清德当局的“以武谋独”“倚外谋独”行径是导致台海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的最大根源。

另一方面，欧盟涉台政策立场的变化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增益效应”。欧盟“有限介入”模式会与美日“以台制华”形成同频共振和相互促推效应，而欧盟在联盟策略下协同美、日、澳等国将台海安全议题嵌入“印太”安全架构的操弄，会助推美国主导的“台湾问题国际化”议程。事实上，美

国近年来为增强“以台制华”效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力度明显加大，极力渲染台湾问题与全球经济安全的重要关联，公然宣称“台湾问题并非中国内政”，大肆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妄图否定联大 2758 号决议并唆使盟友跟进，使涉及台海的关系结构从传统的“美国—两岸”三方博弈，转向“美国为核心的盟伴体系—两岸”这一更具多层性与延展性的三角架构，而欧盟在台海议题上的“泛安全化”操弄和以盟伴体系为依托的涉台政策立场与美国的“台湾问题国际化”正好形成了策应，是在推进以上关系结构的演进，助推“台湾问题国际化”议程，并可能引发其他行为体效仿，使台海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

结 语

2021 年以来欧盟涉台政策的变化是其“印太战略”框架下对华政策的逻辑延伸和具体表现，其关注点不在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法理事实，而是受欧盟参与形塑国际新秩序和争取所谓“印太”话语权的战略诉求所驱使。从深层次看，欧盟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已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折射出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动下，欧盟为彰显战略存在感和影响力而围绕所谓权力再分配、规则主导权与意识形态合法性所进行的战略竞逐。尽管在台海问题上欧盟只是一个“配角”，但其介入无疑会导致台海安全形势更加不稳，使地区秩序更加复杂和脆弱。作为全球多极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极，欧盟与台湾地区的任何“越线”互动都牵涉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与区域秩序稳定。为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欧盟涉台政策立场变化带来的台海安全环境变化和风险，保持战略上的坚决抵制与行动上的有效反制。

同时也要看到，欧盟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虽然可能随着亚太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而加强，但台湾问题并非欧盟的核心利益，其提出的所谓“维护航行自由”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诉求即使不是其泛安全化叙事的一部分，也都属于“普通原则性”的利益。相比之下，对华关系承载着欧盟实实在在的经贸命脉与全球治理合作的大局，在欧盟的对外战略中占据

着更高的利益权重，这种利益结构决定了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行为边界：在战略叙事上可能偏向高调，但在行动上可能较为谨慎，一般不会触碰中国的红线底线。更重要的是，美国现在的战略关注重点正向西半球转移，在“印太”地区愈发显露出以所谓“赢得经济未来，避免军事冲突”为主轴的战略取向。极右翼的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后公然发布涉台谬论，蓄意干涉中国内政，积极推进修宪和日本“再军事化”，并有意加强与欧盟、北约的安全合作。然而，欧盟如果在台海议题上与一个正在走“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并日益对抗中国的日本靠得太近，显然会面临被拖入“同盟陷阱”的巨大战略风险。因此，未来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仍将是一种“有限介入”的模式，由此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仍无法与美、日干涉相提并论。正如博雷利所言，欧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区域外行为体，对印太地区的地区安全动态影响有限”。^[1]尽管如此，欧盟不管以何种方式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其性质都是严重的，必须得到切实纠正。2026年3月8日，王毅同志在两会记者会上谈及中欧关系时指出，中方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格局中的当然一极，是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伙伴。中欧关系要想走得稳、走得好，关键是欧洲要树立正确对华认知。^[2]为此，中方一方面应积极深化中欧各层面交流与务实合作，增强政治互信；另一方面也要强力敦促欧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纠正错误倾向，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着力夯实中欧关系政治基础，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

【收稿日期：2026-01-08】

【修回日期：2026-04-26】

（责任编辑：王霄巍）

[1] Gloria Sicilia and Emily Benson, “Navigating Tides: The European Union’s Expanding Role in the Indo-Pacific,” CSIS, March 5,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navigating-tides-european-unions-expanding-role-indo-pacific>.

[2] 《王毅：中欧关系的关键是欧洲要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外交部网站，2026年3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603/t20260308_11870467.shtml。